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三期 ——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0 1 2 a)

- 【往事追忆】高行健谈文革经历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节选） 毛 毛
- 【自由论坛】不要忘了自由和良知
——评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 汤 本
- 【文献资料】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的有关文件
附件一：邓小平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二：邓小平《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往事追忆】

高行健谈文革经历

访问者：陈军

高：整个外部世界到了文革，一下把我打醒了。从抄家那天开始，这个梦就无法再继续了。抄的是我同屋，他是我们办公室的副科长。这个同屋是老中央大学的大学生，所谓历史有问题。

陈：你那时同住的还有别人？

高：我在集体宿舍里逃出来，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他是老光棍，找不到对象，就是因为历史有问题。他不是外文干部，外文干部就要求出身很好。

陈：他不是副科长吗？难道因为这一点不能找到对象，还是因为家庭的问题？

高：他是历史上有问题。他过去参加过三青团。

陈：那时谈恋爱，都要跟对方自报家庭出身吗？

高：那时如果你出身不好，不是党团员，就挺难。你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团员，就是团员也已经不怎么样了，你最好是党员，否则找对象难。如果要找大学的年轻毕业生，你不是党员，就得至少是团员。我觉得那些女孩子都很可怕，随时都有可能把我告了。我根本没有想过追求她们，或者对她们有好感，我把她们都排除在外，我根本不能找这样的女人谈恋爱。另外，跟我兴趣相同的人根本没有，相同趣味的人简直找不到，只可以是个梦。那时我有过一个高干子弟的情人，因为她的家庭环境非常的优越，所以跟着我没什么关系。她倒比较浪漫，那也是偷偷的，但我们的关系到文革就完了。我那个同屋是个老大学生出身，所以很能理解我的那种生活方式。他自己也愿意做点翻译，因为每天工作很枯燥无味，但至少可以翻译点亚洲的小说。当时还可以出点亚洲的进步小说，它至少比当时的大陆革命文学有点意思。书中还有点爱情和色情，而且他翻的多是内部出版的书，而不是正式出版社的书。他就接一点这样的活做。这些他在集体生活里也没法做，所以就找了以前的一个老关系、老同学，住进了别人叔叔的一个房子里，是个新的房子。那时的房子还没有丢，不过房子已经公交的差不多了。他们是自己的房，所以腾出了一个单间就租给他，要了很少的房租。觉得他三十多岁，一个人非常可怜，算是照顾。我呢，到处想偷找个地方。我本来在集体宿舍就跟他住在一起。他一走以后，我怕别人住进来，我写什么、做什么就露馅了。我觉得这很可怕，很可能被告了。而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有种默契，就是彼此不谈政治。后来，我就到处出去找地方，去找我大学以前的老同学的一个朋友，他是北京人，家里有房子。之后我有时在这家住住，有时在那家住住。后来他们自己住房也开始紧张，我也不能在人家老占着一间房，所以我就没法住了。这时文革也快要开始了。后来我就找到了原来的这个同屋，他对我说，那你就来吧。他那个房子也很小，除了床、两张办公桌，再有一个煤炉也就完了，在一个居民小院。我得有这么一个环境。而且他也觉得我有点老私交。加上我的作风又不是积极上进的那种。他也不是党员，本来就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很不得志，连老婆也找不到，老光棍，都快四十岁了。我是个小伙子，刚出来才二十岁出头，人也不坏，就住一块了。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兴起，第一波抄家。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一下子他就给揪出来了，就抄他家。我跟他住一屋，非常危险。幸亏有个小青年给我通风报信。

陈：他怎么会知道？

高：他是红卫兵，而且是大机关里红卫兵的头。还好他通风报信，我就抢在他们之前把我的东西移开了。接着，红卫兵就到了。因为都认识，加上幸好我在。如果我不在，就一起全抄了，那我可就完了。因为都是同机关的人，年轻人又不多，彼此都认识。他们问我哪些是你的东西？我说都已经分开了。接着就抄他的东西，全都翻了个遍。我知道这次真的很危险。那时，言论控制得非常厉害，我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还能够抵制它，是因为内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没被改造掉的东西。我们的机关很大，干部加上职工有两千人。我在当中差不多算是最小的。我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开始发表东西。之前写过一、两万字的稿子。我写的日记全部被烧光了，那时哪敢留东西呀！

陈：抄家以后，你自己的东西怎么办呢？

高：我烧了一个星期自己的东西。我同屋的东西都被拿走了。那真是很可笑了。比方说，他有耶稣的裸体或半裸体的封面，解放前的英文书。这就拿出来作为批斗他的罪证。因为里面有裸体的照片，就是腐朽、堕落。他这么大年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我冲回家时只来得及翻他的抽屉，找到一张他的照片，是学生的集体照，他穿着制服，头上戴有国民党的帽徽。我只来得及把这张照片拿走，扔到

街上的公共厕所冲走。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结果他们细翻，在抽屉底下的信封里找到了几个避孕套，就问他这女人是谁？还说他们一定是特务关系。你当时根本无法争论。他还写了些颇具失落感的旧体诗词，因为这么大的年级也没个对象，所以里边的那种感伤也不是要针对什么社会主义，他也不敢。虽然意思不明确，是个人的一些感伤情怀，但是被他们一分析，全部可以被用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和反革命的阴暗心理。后来他们把他带走，从此，他就再也没回到这里。从此就被隔离了，一直关着。送到五七干校后，他还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关在机关里。最后到文革后期稍微松动了一点以后，才开始让他在干校劳动。从抄家那天起，他的这个房子就再也回不来了。十年，他就再也没有过人身自由。工资只发给他生活费。在他回来以后，我再见到他时，他整个人完全都变了。

陈：你后来是否也参加了运动呢？

高：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有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现在所谓正版的文革史，即老干部的文革史，例如海外曾研究过的毛泽东、四人帮的文革史，现在已经被驳掉了；讲林彪有林彪的文革史；从别的角度，造反派有造反派的文革史，老红卫兵有老红卫兵的文革史。

为什么文革能发动这么多群众，人人都造反，跟以前十七年的历史有关。那个阶段因为你出身不好、又不是党员，已经有了很多的压抑。而且运动初期，各级的党委就把所谓有问题的人、那些贴大字报的人都揪出来，作为反党分子来转移目标。毛泽东当时要对付的是党内的走资派，他是要解决他内部高层的权力问题，但是他却发动大规模的、从底下起来的群众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造反派这么多、这么普遍，人人都造反的情形。

一开始人们都响应毛泽东的关于揪出党内走资派的号召去贴大字报，然后各级党委就把所有的这些人都打成了反革命。那时最早的、八月的老红卫兵就是这样的。他们因此打击一大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各个机关已经打了一大批人，造成人人恐怖。在街上打死人的事都是老红卫兵干的。老红卫兵直接的后台、在上面挂线的，看是毛泽东，实是刘少奇，比如派工作组进大学。这些老红卫兵是保党委的。因为他们整了这么多的人，所以毛泽东后来才炮打司令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就是整压制群众的人。所以这样一来，人人都想造反。这个时候，造反派开始揪自己的党委机关，头头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时，我们的日子就松了口气，因为矛头已转向了他们。当然造反派也不是就正确，因为他们仍在毛的旗帜下。不过，他们当时自认的方向是正确的。

陈：在两恶之间你选择谁？

高：在两恶之间你选择谁？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两恶都是可怕的，但我选择造反派。我就这么起来造反了。想期待结果也是赌博，期待的可能也是一种赌博。我在这个中间并没有看到什么正义。也许别人看到了正义，那些对毛的思想更迷信的人。我尽管没有那么迷信，但我还不敢怀疑毛泽东到那么彻底的程度。在两恶之间，还没到认为毛是大恶魔、大混蛋的程度。

当时，号召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里边谈到要把国家机器打掉。实际上，这也是列宁的谎话。后来的文革十六条等就是说明毛泽东的这个目的。

人人造反以后，倒霉的变成那些紧跟党委、想积极爬上去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最早起来的、保皇的造反派，还有一些是出身也不特别好，但也不是地、富、反、

坏、右的人。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根本也就别想参加红卫兵。你那时只能不声不响地跟在里头，谁都怕。造反派当时也不是想打出身不好的人，他们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党委来的。所以那时出身一般的人还敢起来。那我当时就是属于这种出身不好和受压抑的人。当然，我也不能算是狗崽子，所以就参加了其中的一派。

当然，我们中间也有出身好的，头头都是出身好的，他们在前头打先锋。出身好的往往不是一般的积极分子，有些是吊儿郎当的，有些是爱讲怪话的。党委不信任的也受到压抑，所以他们理所当然会帮我们说话。所以造反派起来的就是这么一批人。党内的当权派实际上不恨老红卫兵，恨的是造反派。所以邓小平说：文革搞得太乱，指的是造反派。正是那时埋下的祸根，才使七七年党的全面统治反弹这么大。那时的揪斗运动就是毛的讲话和江青的煽动所掀起的，所以才有后来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党政机关的革命。

文革不是十年，是两年多到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觉得造反派已经过头了、已经失控了，毛泽东已经用他们达到目标，所以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这是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为目标，当时找了个罪名，说清华大学有人扔手榴弹。那时，军人镇压学生已经普遍，因为学生开始冲击军队。军队是保守的，所以军队开枪镇压已发生了很多。但这个时候呢，上面就找了个借口，说蒯大富他们有野心，所以派工宣队进驻，这等于全面军管。工宣队背后是八三四一，是毛泽东自己的警卫部队。这就表示着文革的全民运动结束了。接着就是全面军管，连当时我们这样的国家机关也军管。所有的文化机关、国家机关都要全面军管。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学校不是军管，就是工宣队。这就是林彪的控制，因为军权受他的控制。所以到了九大，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军人。群众组织已经完了，军队也不要那些老干部，所以上台。真正来说，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呢？学生只搞过几次，像批斗王光美给她挂乒乓球了，学生最多就是给人剃个光头。真正那些坏事都是在军管时期做的。所有那些杀人的事，一是红卫兵初期，我就亲眼看到过他们打死人，有人干这种事。

陈：你说你是看到被打死的过程还是只是打人？

高：我直接看到他们打，到死，在西单。那是个地主婆挂着个牌子。旁边的人过来过去，不看。红卫兵都是青少年，男女孩子，劈头盖脑地打。每打一下，那血一下就出来了。用的是铜头子。我看到她已经都不能动了，像狗一样地爬在那儿了。很多人都喊着：地主婆。

学生本来不知道，是街道居委会、派出所提供的这些人的成份、户口名单，否则学生不知道抄谁去呀。所以，都是有人在后头煽动的。所以第一次的红色恐怖就利用了这些学生、青少年。这些人还都不是一般的工人和平民子弟，都是自然红，革干、革军的子弟，所以打人凶残的都是他们，而且得到谢富治的公安部的支持。还有很多恐怖的事，以及外省的集体屠杀。当时有很多内部简报，我都是在后来才看到的，像北京郊区就发生将地、富、反、坏子弟全家人口集中起来，集体屠杀，用锄头、砍刀、扁担，活活打死。当时的中央的内参上就有这些。我是在文革后期看到的。我的一个朋友是高干子弟，我在他家看到的。

这样的恐怖不是群众运动，不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干的。这些不应该算在文革的帐上，应该被看作是老干部所代表的、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对老毛的党内斗争反弹的结果，他们要把目标转移到这上头去。就是学生有后台，不是完全自发的，包括最早的人。像清华的红卫兵怎么起来的，各有各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很快就跟上面的线挂上了。

其二就是军管。六八年进驻大学以后，所有大学生就分配，中学生就下农村，

干部下五七干校。凡是军管会、军代表认为不安分的人，那时候成份也很重要。在群众的两派冲突中，军管会通常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但也有例外，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的结果。然后就把另外一派的人下放。我后来就歇了几年。

陈：你在两恶当中做选择，你是参加红卫兵揪别人？

高：另组织一派呀。那时候，红卫兵到处打人、抓人，没有人敢管，没有任何势力组织阻止得了。原来的系统里的党委还讲讲政策，但是其实那些被抄的人的名单都是党委在后面提供的，他们不出面。那时谁能知道谁家的档案有问题呀？普通人、同事之间没人能知道谁有历史问题。

所有的那些老红卫兵，背后都有党委、政治部门提供的情况，他们才去弄的。正因为背后得到支持，所以他们在外面大打出手，没人能制止呀。第一次死人多是八月份，是八月份开始起来的。然后到了造反派起来的时候，是那些受压制的人；在有些地方是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人；还有一帮是同情他们的，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不是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

我不用组织红卫兵。你们要去搞，我也会搞。在各派冲突中，你只有当时成为一种组织，才有势力。这样对方一看你，也就怕了，因为也是一帮子。这就是为什么派战全打起来。开始是保守派和红卫兵打，后来发展到群众组织，更大范围地打，两派人对打。当时问到想抄谁，结果下一个要抄我了。既然他们敢，那么我这一帮就得准备拼。那时，全部都土匪化了。敢抄老子的话，那咱们就得走着瞧了，对不对？那时，你得随时防备，因为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这一派也有出身挺好的。出身不好的已经没有资格在里头轻举妄动，只能在背后同情造反。所以，对方的说：你们搞这么一批牛鬼蛇神，我们就说他们支持走资派。互相看对方里头有谁可以揪的、可以抄的。到了以后，造反派里头也可以抄，哪怕你出身好，也可以抄。他们先来个突然袭击。双方的武斗怎么开始？就是这么开始的。那我要是自卫的，我也扬言：你要抄我，我就抄你。

不过，这个武斗并不严重。在没有军队干预之前，这种武斗就跟打架似的，最多打破了头吧，也不至于出了人命。不过，以后就厉害了。在外地，当军队介入两派以后就不一样了：枪炮都动了起来，双方背后都有背景。你是这个军区支持的，他是那个军区支持的。野战军跟当地驻军支持不同的派别，又跟中央的斗争牵扯在一起。实际上，所有的大打，都跟党内或毛的系统、林的系统、江的系统、或谁的系统之间的上层斗争有关。

到了全面军管以后又厉害了，又是一轮大恐怖。在军队的主持之下，比红卫兵还要厉害。他们比红卫兵内心要更狠：什么吊打、逼供信。那时，一般的造反组织做不到这种程度。运动初期的红卫兵还可能做到把人关起来和设牢房；到了军队管制时，只要军管会一句话，马上就开大会，宣布某某有问题，哪怕你在运动中没有表现，只是历史上当过国民党的兵，被抓过俘虏。按当时公安六条，要连长以上才够资格，也被作为反革命揪出来；或者观点不一样，也可以被救出来。先揪出来，再审查。然后按上各种各样的帽子。

陈：当你看到人被活活打死、人人都造反的时候，你是纯粹出于自保自卫的心理去参加造反呢，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高：当时非常恐怖。如果我要是敢出来说一句话，马上就能被抓进去。恐怖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我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晚上也就十点左右，我去一个大学同学那想了解大学运动的情况和最新的教育情况，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大学的动态嘛。

当时人还没有到那么敏感，先敏感的基本都在那几所重点大学。我回家的时候正好碰到了“联动”，即“联合行动委员会”。参加这个“联动”的要求可严了。他们里面连工人子弟都没有，基本上都是革军、革干，还分有等级。所以都是比较的高干、至少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子弟才能勉强进去。而那里面很多都是高干，完全就是高干背景。他们衣服上戴着的是红袖章，绸子的红袖章，黑字上面写着“联动”。他们全骑着摩托，清一色的摩托。你说这摩托哪来的呢？不都是他们的家里提供的嘛！那时几乎所有的人一下班就赶紧回家，别出门惹事。而我的家里那时父亲刚刚被送劳改，我还不知道我爸也有问题。我哪知道呀？我是后来才知道我家也有问题。我那时还以为自己是清白的呢，所以才敢在晚上骑车出去。不过那也是提着心、吊着胆的晚上都像戒严似的。一天我晚上骑车出去被拦了下来，要我工作证。那时工作证上都写着成份，还好我没事。下面接着来的也是个骑自行车的，剃个光头。那才叫恐怖。有些身份不好的人先把自己的头给剃了。那是在钓鱼台附近，周围街上都是警卫。为了安全，有些警卫还给放得很远。尽管如此，他们照样在路上放了一排摩托车，使所有的人都得经过他们。我是刚走，后面就传来那人哇哇的惨叫，一阵的打呀！我连头都不敢回啊，赶紧跑。

那时候，机关为了加强警卫，年轻点的人都要留下值夜班。我有时也留下来值夜班。一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他们从黑夜冒出来。他们主要是到各机关造反，抓反革命。当时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见一片嚷嚷声。他们看起来是很有来头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进来想干什么，也认不出他们是谁。这时，他们突然把机关的车子给封了。结果找了保卫处的人出来，保卫处的人还打官腔，问我有那么重要吗？可笑的是，他还觉得这只是小孩胡闹。

刚开始这些孩子只是要破四旧。例如西单的小吃店里，那时贴着“狗崽子不许进来”，“为工农兵服务，狗崽子滚出去”。开始时还觉得挺好玩，觉得只是小孩在瞎胡闹。后来一天天地，人们发现形势变得很快。先开始，凡是女孩子扎长辫子的，就是资产阶级作风。跑到街上，也是女孩子，年轻漂亮的，在那破四旧。那时只能剃红军头，显得有档次的女军头。那时，你要是穿高跟鞋，见了就把鞋给你劈了，你就只能赤着脚，拎着鞋走，那个狼狈呀！这帮学生们觉好玩，在那瞎胡闹。我们大人呢则觉得小孩子失去理智了，在胡闹。

陈：小孩子胡闹，也没人敢出声吗？

高：没人。打死人的都是小孩子。我一个同学的小外甥当时在上中学，在北京。他们有个老师，一个老教员。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拿着个铁钉子捅着他的下腰，让他交代，交代什么反革命罪行。怀疑他是反动家属，因为他有时到郊区以外去查看史料，就怀疑他是反动家属。就这么个罪名。那女孩子想玩这玩那，最后就拿着个铁钉捅在老师的后腰上，那还是夏天。她问老师：“你说不说？”不说，就敲钉子，噗的一下子。再不说，再来几下。几下子，钉子就进了肝脏，老师马上就死了。送医院也无法抢救了，都捅到肝脏了。

陈：在回忆一个人过去的时候，很少能听到一个人反省他自己的作为，好像都是环境的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高：是，人人都受苦，人人都是受害者，但是人人也都是暴徒。在那时，人人都是暴徒；而现在人人都是正义，什么“因为我为了维护正义，我受了苦”，什么“我是无辜受害”。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在集权专政的压制下，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徒。你没成暴徒，只不过是有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你没成为暴徒。但是在那个基本环境下，你必须成为暴徒。如果你已被打成反革命，你就谈不上是暴徒了；但是你没被打成反革命的话，要你揭发别人的时候，你就得凶狠地揭发别人。能保持清醒是极难做到的。就算你是装凶狠，你也得凶狠，哪怕你是伪装凶狠。

我承认我在当时的情况下就象个赌徒和暴徒一样。我当时是为了我的反压迫，但是你的反压迫用的是谁的口号？是毛泽东的口号！压迫和反压迫者的人都用了同样的口号。你能离开毛泽东不喊他的口号吗？那些口号本身就是暴力，他的口号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最法西斯的暴力。像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打倒”……都是暴力。“打倒”说的意思，就是让人失去自由。你喊出这个话，打倒某个人，他跟你同一个单位，在这种批斗会上，你说你喊打倒不打倒？每个人只不过是积极的程度不同而已。你说你根本不举手，不喊打倒，这人马上被揪出来。

因此，在客观上，人人都是暴徒。你不是牺牲者，就是暴徒。你扮演不了另一个角色。你自认为牺牲者就拥有正义，但你会发现，牺牲者只不过是这个肮脏的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你并不是因为正义而被牺牲的。你要作刘少奇吗？刘少奇不是刽子手吗？我们且不说他运动初期搞了多少人，就说他在以前的革命时期搞了多少人，以及他的左倾路线搞了多少人。他在共产党内部他又杀了多少人？他现在这个时候好像是个牺牲者、一个正义者。拨乱反正算他正确，他正确什么呢？他也是绞肉机中的一个机器，只不过他被别的机器绞了，被更强大的机器给绞了，因此没有正义的牺牲者。谁是正义的？维护刘少奇十七年专政的人是正义的吗？那个专政仍然是个专政。当然这也不是刘个人的问题，他不是个英雄，是老干部回过头来需要这么一个英雄、一个烈士。他本身同样是这个屠杀机器里的工具。如果像他那么极端的人台上的话，也是可怕的，他对别人也会是残酷的。

所以这里必须跳出共产党的逻辑来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也是暴徒？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你是不是也是赌徒？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正义。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民主与暴力的斗争，这里都是暴力，是共产党的甲派和乙派、毛派和周派，或者是毛派和刘派。他们的前提都是无产阶级独裁、专政。暴力，他们都是赞同的，只不过是落在谁的身上而已，用的分寸而已，手段是不是更合法而已。这里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要有这个认识，这在中国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第一：你敢不敢对共产主义的暴力置疑。第二：要对自己置疑：你在这个暴力下，你是不是也成为了这个暴力的一份子。你要有这个认识：你并不代表正义，你不可能代表正义，那个时候没有正义。你只不过是乔装打扮。如果说我当年是反革命、两面派，我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要不然我怎么生存？我就得是两面派。我喊着毛泽东，但不信毛泽东。不过，我要不喊，那我马上就是反革命。

因此，在这个集权的政治下，你要逃出这个绞肉机，逃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中国当时用陈毅的话说：天网恢恢连刘少奇他都逃不了，还死在监狱里，谁还逃得了？然后就是这个户口制度，你无处可逃。我当时整个的感觉就是要逃，一直在逃。尽管我最后还是逃出来了，但在中国的时候我就要逃。我主动要求下放，就是逃。因为这太恐怖了。但是怎么逃得了呢？逃了半天你逃不掉，但还得逃。逃不掉，无处可逃。无处可逃，那你怎么办？你就必须得伪装。哪有那么清白的？我就把“毛主席万岁”喊得响响的。我不能让任何人怀疑我还有潜藏，还有什么别的想法。你跟所有人讲话全是冠冕堂皇的，否则人就揭发你，所以你就得装模做样。

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没有鲜血，那你要不就是软弱，天性软弱，要不就是你还有过去的文化背景，你做不了那种极端的事情。我就做不了那极端的事。叫我打人，我就打不了。除非在对打中，我才会还手。叫我好端端地打个人，我反正打不了。我前面说过那个回忆在起作用，即童年生活的回忆。但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人就可以打人。为什么那些小孩子，像我看到的那个女孩子，那么文弱的、亲切的，怎么就可以挥着皮鞭子打人？那是因为她没有一个教育的背景。但是，你要让个年记大的人去打，他就打不下去，因为他有个背后的文化。但是，你要叫个工人打，他很容易打，老工人还可以打；但你要叫个老知识分子去打人，他就很难，因为他有另一种文化在里头，他打不下来。但是他得伪装，至少他得喊口号，叫得很响，而

且表现得义愤。那这个人的义愤是不是压力、是不是暴力？同样是暴力！你同样构成了暴力，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动作而已。

∞ ∞ ∞ ∞ ∞ ∞ ∞ ∞ ∞ ∞ ∞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节选）

• 毛 毛 •

◇ 不变中的变数

古语说，福兮祸所伏。也就是说，在你愉快的时候，不愉快的事就会接踵而来。不幸的是，古语所说，往往准确。

刚到江西来时，父母亲每月工资仍按被打倒前一样照发，父亲是行政二级，404元（“文革”前规定，中央一至四级工资都是404元）；母亲十二级，120元。但1970年1月，他们收到的却一共只有205元。妈妈请黄干事问问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时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

工资改成生活费，在1970年一开年，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安和猜疑。2月9日，父亲提笔再给汪东兴写信。

信中首先通告情况，父亲写道：“上次写信后，到现在又有两个多月了。这期间，我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情况，同上次报告的没有什么变化，每天仍是上工厂（劳动时间减少了一小时），看书，读报，听广播。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文革”中，父亲给中央写信，除了有关的政治问题外，凡提出要求，就是为了孩子。在这封信中，他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团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他写道：“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二十八岁了，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在为孩子的事提出请求后，父亲提到了生活费的问题。他写道：“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二百零五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饭二十五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十元），两个大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约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

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一百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这句话既是对组织上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讲的。信写完后，父亲意犹未尽，他提笔再写，提出：“小孩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信的结尾，父亲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读了上述信，即使是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体会到当时那充满父亲心头的忧思。比起与亲人隔绝的禁锢关押来说，现在能与子女相聚，已是奢望所及了。但是，政治前景的不测，全家生活的担当，仍使他心头重负不释。他不能不有所思，不能不有所想，不能不为了全家，为了子女，去请求帮助。

此信送走，虽没有得到答复，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变化。

政治上没有不好的变化，是好事，但经济状况改变，家中的生活也必然有所改变。

首先，父母亲在平时就已相当俭朴的生活开销上，进一步节省。肉，儿女在的时候，要吃。儿女不在，尽量不吃。再多养几只鸡，可以有鸡蛋，又可以吃鸡肉。每顿如有剩饭剩菜，留着下顿再吃。还有，就是从父亲多年的生活习惯中节省，茶叶，太贵，以后不喝茶了。酒，就只买江西本地出产的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抽了几十年了，一下子戒不了，但可以减量。

光是节流不行，还得开源。

寒冬一过，初春刚来，父母亲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荒”种菜。战争年代，他们在延安开过荒，在太行山开过荒，现在，他们要在自己家里开荒了。全家合力，院子前面一大块地不久就开好整好了。战士小贺帮我们买了些菜籽，有辣椒、蚕豆、豇豆、西红柿、茄子、小白菜等等。我们挖好小坑，撒上菜籽儿，一畦一样，盖上土，再浇上水。新开出的菜地，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清香。在院子后面的小柴房前，我们也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了丝瓜和苦瓜。新买来的几只小鸡，跟在大母鸡的身后，叽叽叽叽叫得欢，原来空旷的院子，顿时充实生动起来。

3月来了，北方的春天也将来临。春耕春种在即，插队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所在的公社大队。飞飞也要走了。走的那天，妈妈自然是控制不住，早已眼泪涟涟。而父亲的伤怀，却是内在的。他还是那样无言，还是坚持去工厂劳动，却在劳动时突感不适，脸色苍白，满额沁出了冷汗。妈妈闻讯，赶忙和工人们一起扶他坐下。妈妈知道父亲一定是犯了低血糖的老毛病，她问旁边的工人，有没有白糖，说喝一点糖水就会好的。女工程红杏赶快回到在厂区的家中冲了一杯糖水拿来。父亲喝了后，略感好转。工厂内没有汽车，陶排长找了一辆拖拉机，自己开着，把父母亲送回步校，并将父亲扶送上楼躺下休息。

我们把窗帘拉上，让父亲静静地休息。我们都知道，父亲这次犯病，完全是因为儿子走的原因。在父亲的心中，家庭、亲人、孩子，是他最珍贵的，也是他现在所唯一拥有的。

飞飞走后不久，我也要回陕北去了。我真不愿意走呀。我们一走，留给他们的，就只有离情，只有期盼，只有无尽的挂念。

◇ 峰回路转

林彪自爆后，虽然众口一词都说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但毛泽东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林彪叛逃后，主席就大病一场，所以林彪叛逃对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有一次，我们听见主席又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民谚，心里就难受。我们安慰主席，主席反而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是屁话。’”林彪事件的爆发，使得他不得不对一些具体措施重新审视，特别是对于一些以前他认为既要革命就必得矫枉过正的“文革”中的过激做法，加以更正。

林彪覆亡后，首先，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交由周恩来主持。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原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工作。

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务院（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军队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革”运动方面，由江青集团全力“担当”。

不过，不管在人事上怎样安排，总之，毛泽东是对于“文革”以来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审视，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文革”初期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有所认识，在一些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进行纠正和调整。

在纠正一些极左过激做法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逐步地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干部，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首先，毛泽东为被批判为所谓“二月逆流”的高级干部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来他又多次作出批示，要求纠正对陈云、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对于这些曾和他一起生死与共、共同战斗、共同开创新中国历史纪元的老同志，他真诚地做出了自我批评，多次公开讲道，处理有错，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并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对于此时已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他也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在毛泽东做出自我批评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立刻抓住时机，从全局上尽其可能地、尽快地推动干部的解放工作。冬天虽然寒冷，但一阵暖流开始流动在人们的心间。

在林彪覆亡之后，在大批解放干部之时，毛泽东一定想到了邓小平。1967年，在“文革”闹腾得最厉害时，他就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那么，此时，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更为现实。

1972年1月6日，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在京病逝。

1月10日，一个时值三九却并不寒冷的冬日，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陈毅追悼会。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上，在长长的大衣里面，毛泽东仅身着一袭睡衣，花白了的须髯垂在颌下。他走到从井冈山时期就与他在一起的老战友、老部下的遗像前，郑重三鞠躬，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 委以重任前的观察

林彪自爆，造成了接班人位置的空缺，也使人们对于“九大”乃至整个“文革”路线的正确性产生了质疑。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提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林彪事件带来的诸多“后遗症”。

为准备“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于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在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决定从湖南调来的华国锋和上海调来的王洪文，与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三人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等起草政治报告等“十大”重要文件，由王洪文负责主持修改党章的工作。这次会议的一个积极成果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十三名老干部。

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郑重地向与会者强调，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在这一次人事变动中，最为醒目的要算王洪文。

王洪文的发迹，为江青集团大大地增加了实力。可以说，至此，在党中央内部，形成了一个由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所组成的“四人帮”集团。

“十大”之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

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但对这个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究竟可以使用到什么程度，仍需认真观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林彪倒台，使这个问题上升到最为重要的地位。“十大”前后，在批判林彪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批判两千年前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并由此又展开了一轮新的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央文革一伙趁火打劫，借此掀起轩然大波。10月，江青在清华、北大发起了教育界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纠正极“左”做法、解放老干部的春风刚刚吹过，秋日批判的肃杀之气就直逼而来了。

父亲到国务院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日常工作，并开始介入有关的外事工作和会见外宾。

1973年10月10日至14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父亲以副总理的身份陪同客人到桂林参观访问。在送走外宾后，父亲专程到湖南，到韶山毛泽东旧居参观。

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委屈，但在父亲的心中，对于毛泽东，始终是敬重的。

这次到韶山，是父亲向往已久的。他说：“1965年想来，工作忙，没来成。1966年又想来，后来就来不成了。”这次来，他仔细而认真地瞻仰了旧居中的陈列。看到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的遗照，父亲感慨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30年代他和毛泽覃曾经一起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不久之后，毛泽覃即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九岁。看到毛泽东二弟毛泽民的遗照时，父亲说：“我认识毛泽民，还认识他的妻子钱希均。他是1943年牺牲的。”毛泽东一家在革命战争中，一共牺牲了六位亲人。为革命，真可谓满门忠烈。参观毛泽东旧居，让人不禁感慨万千。毛泽东，这三个字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个人的功过成败，而是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全部历程。无论它是光辉灿烂的，还是艰难曲折的。

当父亲在国务院迅速进入情况，埋头处理着千头万绪的工作的时候，1973年11月份，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973年11月，基辛格博士访华，周恩来与之进行会谈。会谈十分辛苦，一直进行到凌晨。会谈后周恩来稍事休息，一大早又再次与之进行会谈，并到机场为基辛格回国送行。送行回来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已经睡了。后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没有立即向他报告此事，并认为会谈中有“错误”，便雷霆震怒，说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

周恩来刚刚大量便血，刚刚告病住院，又以抱病之躯连续作战地与基辛格昼夜会谈。本来谈判成果很大，连毛泽东都十分高兴，不想却因这样一个“意外”酿成了一场批判。他不得不抱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自己。会议中，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而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却以为“倒周”的时机到了，想借这一机会打倒周恩来。他们恣意对周恩来进行诬蔑性的批判。江青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周恩来重病在身，听着这些恶意诬陷，他虽然心中气忿，却只能以沉默对之。

会议的中间，毛泽东曾问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小平发言了没有？”毛泽东要了解邓小平的情况，要了解邓的态度。

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的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发言的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寥寥数语之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讲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

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但这一事情，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进行认真观察。而观察的目的，是他将要决定委邓小平以重任。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对于批周的会，毛泽东先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接着，他就批评江青一伙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

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此前，在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封批评江青的来信上批示：“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江青进行批评。“批周”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

□ 摘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

【自由论坛】

不要忘了自由和良知  
——评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  
• 汤 本 •

一、“永不翻案”哪里去了？

读邓小平女儿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新民晚报连载），自然产生很多感触、联想、评议，将不会是一次、一篇文章就可以写完的。

毛毛的回忆录，给文革研究带来新鲜资料，她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也可成为文革研究的一部份。但她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大革命研究，将成为文化大革命学，这是无疑的。很多经历文革的海内外中年学者专家，深度分析文化大革命或文化大革命遗留现象，针砭时弊，十分入木。其功力，来自于作家自己的独特思考。他们直接研读生活本身，不虚文，不粉饰，讲真话，他们的高度的概括能力、发现能力以及感悟真理的能力，给历史留下见证和思考。

《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先是留下一个巨大的政治之谜。毛泽东为什么在听任四人帮，或者直接说他自己的强人意志，将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等等整死、饿死，独独留下邓小平的活路？历史的友情使然？也许是一个原因。毛泽东始终对在自己的政治冒险、闯荡生涯中，在险要关头和自己站在一起、救助过自己的人，即便在一段时期内，这些人不和他完全同心，在一条路线上，在整肃斗争中，还是网开一面，留下“人情”。叶剑英在长征途上，冒着生命危险，向毛泽东报告张国涛的“灭毛行动”，救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初期，尽管叶剑英成了“二月逆流”的主将，在斗争批判中，毛泽东还是保了他。林彪垮台，毛泽东便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叶剑英，这也是叶剑英、汪东兴与华国锋合手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逮捕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重要条件。邓小平也是如此，毛泽东在文革前几年完全发放工资给邓小平，让他在江西居住时，住在一个军校的校长的二楼小楼中，这都是刘少奇等人做梦想，苦苦求都求不到的。

历史的原因外，根据一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邓小平延误刘少奇执意要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十分关键的一次中央全体委员会的召集，也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刀下留邓的原因。如此次会议召集成功，对毛泽东的权威将是沉重一击，虽然依仗军权和林彪的支持，毛泽东不会致命，但在党内占多数支持刘邓。多数中央委员支持刘邓路线，极可能反对文化大革命，给毛泽东一个重大的反击。

刘少奇政治上太天真，以为还有党内民主。邓小平早就看出毛泽东林彪合流的要害和集党政军权力优势，势不可挡。于是邓小平缚手待毙，使得毛泽东认为这个“四川小老弟”对他还有余忠和愚忠，抚今忆昔，留下一条活命之路给他。

第三个原因，也许，毛泽东当时对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也“预留一手”，也可看出毛泽东在搅动大政治浪潮的时候，百万人丧命的同时，没有忘记要有收局的

人。难道毛泽东自己已经感觉到自己是在搞“革命实验”？或者“实验性的革命”？

毛泽东留下邓小平的用意，以上几句话还是很粗糙的，但这至少可以表明，毛泽东为什么留下邓小平，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文革专题的研究项目。毛泽东是一个独裁者。一人独裁，文化大革中登峰造极。一人掌握党内所有重要领导干部的生杀大权，升迁大权。被监关中的邓小平自己也没有人权，他没有与老朋友交往的人权，他没有探望自己自杀未遂惨造伤残的儿子的邓朴方的人权，他没有让在乡下插队务农的女儿来探望他的人权。

毛毛的确写出了有人性一面的邓小平，也写出了还有人情味的邓小平。毛毛认为，邓小平在一生写的最多的信就是在自己被监管时期，很多信，是为了子女的和写，毛毛和毛毛弟弟分别上了大学，就是邓小平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信的结果。但是，毛毛没有意识到，在邓小平家庭受迫害的同时，多少个家庭遭受到迫害？他们是没有地方可以写信恳求帮助的，他们的人的权利哪里去了呢？

在迄今读到的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章节中，毛毛最大的败笔是隐去了一句邓小平一生最为关键的话之一，这就是著名的“永不翻案”，那是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写信向毛泽东表示悔改之意，表示自己的错误，“永不翻案”，毛泽东在1972年8月14日批示，为邓小平复出的最重要的一个批示。但是毛毛却把它隐去了。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人可以理解那个时代，邓小平违心的也罢，还是邓小平韬晦之计也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顺应了那个时代的民意。但是，毛毛不敢提这个“永不翻案”，她缺乏站在省思高度来写邓小平的思考能力和精神魄力。这是令人遗憾的。

毛泽东两次打倒邓小平，只能说明毛泽东最后坚决笃信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他的“伟大”是不可动摇的。除了私人性的固执和自私之外，毛泽东以他的共产乌托邦的幻想，以他的个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甚至“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政治业绩，作为他人生的终结，他不希望一个邓小平的“整顿”，把他的政治成就最高点给打消。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毛泽东把千百万人的生命的毁灭，把亿万人的生命的虚掷，成就了他的“实验性革命”的“成功”则是人类史上的政治灾难和政治悲剧。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大陆的可怜的经济发努力上，即便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邓小平没有错，而只是做的远远不够，远远不能满足亿万人民的民意。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大刀阔斧的改革，邓小平不仅做到了“永远翻案”，而且是，大大翻了案，比翻案的程度超出十倍以上、百倍以上“改革”，在经济领域、市场领域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既然，历史上有子为父隐，当然也可以有“女为父隐”，可惜“永不翻案”是隐不掉的。四十五岁以上的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都应该有这个清晰的记忆，“传达中央文件了，邓小平表示永不翻案，毛主席说他绵里藏针，人才难得。邓小平将复出工作。”如果，毛毛连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都要隐瞒的话，她的作品中，还有多少隐瞒，还有多少忌讳，还有多少“女为父隐”，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人物在历史中所经历的事实，所发生的行为，需要极为客观的描述；历史人物在历史的作用，需要极为客观的评价。史家不应拔高，也不应贬低历史人物。作为女儿的史家，毛毛拥有了常人所没有的资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等方面的很大优势，但是，如何以反省的而不是一味歌颂的，如何以在一个开放的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时代，用以被时间证明是非的现代理性，用宽宏的时代视野，用超出今人政治束缚的思考精神，来写邓小平，对于今天的毛毛来说，绝非一件易事。

笔者深信，如果，从以往的历史灾难中，毛毛产生新的探索性思考，才能使自己的以往生活的苦难变成自己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毛还年轻，她还有很多机会。只有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的天地中，才能写出一个真实的邓小平。也才能真正写出邓小平的成就和他的局限。

## 二、“永不翻案”出来了

终于，“永不翻案”出来了。

笔者在7月12日撰写的本文第一部份《“永不翻案”哪里去了？》指出邓小平之女毛毛在她的新著中没有谈到邓小平检查时向毛泽东表示的“永不翻案”的关键词语。而这次检查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后第二次复出的关键性检查。笔者认为毛毛不提这关键性的词语是有意隐去此语。在此批评后，毛毛在7月17日在接受文汇报记者访谈时，提到了“永不翻案”，访谈的准备不会是几天，因此笔者并不认为这是笔者的文章影响了毛毛。但是毛毛没有在书中提到“永不翻案”，而在访谈中谈到“永不翻案”，至少是收到很多反映之后的一个回应。文章有笔误或者笔漏，及时纠正，这显然是好事，可见，毛毛还是一个正视历史事实的人，如果再版时，笔者以为，毛毛应该而且必须把此话再加进去。

但是，毛毛的在访谈中对“永不翻案”的解释却很牵强，她认为“我也理解了他为什么说‘永不翻案’——这是他对党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决定的，这绝不是一种政治上的韬晦之术，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也不计较党在一时一地犯的错。”

显然，毛毛还是陷于旧的政治语言和政治传统中思考问题，或者心里不是那么想，嘴上还必须那么说，先不来评论邓小平晚年对“党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究竟有什么看法。邓小平的“永不翻案”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韬晦之术，运用得非常之好，非常的得民心，对于老毛这样的非我必诛的独裁者，只能也必须用这样的韬晦之术。毛毛实在没有必要否认。再者，邓小平先生他自己应该计较“自己的得失”，因为他的得失，就是当时中国大陆民众的得失，他代表改革整顿的潮流，他代表中共党内非毛化的相对务实开明的、纠正毛泽东灾难性罪错的趋势。

正如李泽厚先生与刘再复先生的《告别革命》中所指出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焦虑，使得中国人饥不择食，急性革命，延续到毛泽东的灾难。

很久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的心态常常是在“狂妄”和“谦卑”两个心理极端徘徊，毛泽东自己就称自己“虎气”与“猴气”兼有之的人。毛泽东的“狂妄”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狂妄”，亿万人民的“狂妄”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毛泽东的“狂妄”。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这也是一个大题目，不是一本两本书写的完的。中国文学、文化的“浪漫”、“现实”的双重特性也是这种极端心理的渊源之一。

文革中写思想汇报，写下入党申请书，就是“狂妄”和“谦卑”的心理极端的双重结合。文化大革命结束快二十四年了，沉静下来看，中国大陆高层领导能够时时把握最高管理权（不是最高决策权和最高领导权）人之中，不狂妄，也不谦卑的人中，可能算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时时想抓住机会，想整顿，想复辟到文革之前，以自己的改革终止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中国大陆老百姓有喘气的机会，能够过少好一点的日子。他们在西方生活过的经验使得他们清楚的意识到中国是何等的落后。因此，在风庆轮一案中，在中共高层算是经多识广的邓小平对四人帮大吹特吹“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伟大成就——一艘不满万吨（四舍五入才算万吨）的

海轮《风庆轮》远洋归来，表现了高度的冷静，邓小平说：“这算什么，我去法国留学时所乘坐的轮船已经有三四万吨”。四人帮把他批判成“崇洋媚外”，实质上，恰恰是邓小平不狂妄，冷静理性性格的体现。事实上，在治国理念上，周邓才是真正的政治伙伴。毛毛写到他们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盟誓”，也是极为有趣的极有内涵的历史实情。周恩来问邓小平“有没有变化？”，邓小平坚决回答“没有变化”。他们知道，中国再不改革，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无论历史再怎样批判毛泽东，毛泽东的夸张的民族主义（他也有这复杂的国际历史因素的推动）仍然有着他存在的历史现实性；无论历史再怎样批评周恩来邓小平，周恩来、邓小平的爱国、救国的焦虑通过当时罕见的理性、务实思考和政治努力表现出来（至少是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的人中）。当然，他们这一代人身陷其中，自己看不透自己的错误，理所当然，下一代人的眼光应该更为透彻。

令人惋惜的是，毛毛至今还只能在旧政治思路、旧政治术语中来写他的父亲，而不是从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冲撞交汇的光彩中，来写他的父亲。

至于邓小平先生“也不计较党在一时一地犯的错”，此语也是极不准确，应该是毛泽东、党以及多数中国人的犯了几十年的错误的。邓小平不仅一直十分计较，而且以他晚年的经济改革、社会开放的种种艰难的努力，来表示自己对毛泽东、中共、中国多数人民犯错的深刻“计较”。为了有利稳定过渡，他当时高举“毛泽东”是富有智慧，但是他深刻地改变中国大陆，也是说明他内心的“计较”。

这种“计较”非常之好，海内外华人如果真正计较下去，从毛泽东肆无忌惮整肃代表人民改革整顿愿望的邓小平，更深看到文革时极权的制度的祸害，也看到独裁政治利用人民伤害人民的实质。

真是可惜，身为邓小平之女，由于社会局限，不仅不能把一句“永不翻案”常人都能解释的词语解释好，还不能将自己父亲的智慧阐述清楚，更不要谈能够深刻分析邓小平改革的深刻历史意义了，能从邓小平的“思辩精神遗产”（朱高正语）获得智慧。无疑，历史不会忘记邓小平，但，历史一定会超越邓小平，中国大陆经济的自由，经由复杂的进程，必然会导致政治的自由。

1961年，美国的甘乃迪总统说过，“我们秉持自由的理念，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承诺，也是我们对别人唯一的承诺。”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总统的一句话“诚实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个人来说，将会带来最为有效、响亮的政策和作为。”对于写作者和研究者，都很有启示意义。自由的社会条件，诚实的写作心态，是传记作家最为成功的两项基本保证。

毛毛是亲身经历父亲两次被打倒所身受的政治压迫和生活艰困，应该懂得，所有阻挠压制自由思考的力量都不会长久的。不要顾忌眼前的政治局限，不要忘记自由和良知，毛毛应该以诚实，写出自己的心。

~~~~~

【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的有关文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

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严于解剖自我认真作自我批评。全党同志都要从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的教训中吸取教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

（注）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

附：（一）邓小平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二）邓小平《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附件一：邓小平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见本博物馆：文献资料馆或本刊 z k 9 9 0 7 a ——编者】

附件二：邓小平《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现将他的检查其重要错误的部份和叙述他受王明“左”倾路线整他的简单过程，摘录如下：

◇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

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自龙州动身，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〇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的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

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消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〇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来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问过，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

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叛徒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客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

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